

亞際華語圈的文學流動

論《蕉風》與臺馬文學關係

張錦忠
國立中山大學

前 言

《蕉風半月刊》創刊於一九五五年，彼時馬來亞與新加坡仍在英國殖民政府治理之下，還未獨立建國，馬共退守馬泰邊境，展開地下反殖鬥爭，中華民國撤離中國大陸，在臺灣延續國民政府已有六年，南北韓戰爭停火沒有多久，美國開始介入越戰，東南亞洲的東西對壘冷戰局面於焉形成。在臺灣生產的民國文學與在星馬生產的華文文學同屬華語語系，區域地緣相同，有共同市場，臺馬文學關係的發生，自有其歷史與政治經濟因素，值得考察。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國共內戰及其結果，國民政府不會遷臺，馬華文學場域很可能就不會出現《蕉風》這份文藝刊物。本文檢視戰後臺馬文學關係，描述兩地的跨域文學流動，即以《蕉風》為案例，分四個面向論述：（一）冷戰與美援文化、（二）臺灣作家在《蕉風》、（三）黃崖主編《蕉風》時期的臺灣現代文學、（四）七〇年代以後《蕉風》裏的在臺與臺灣作家。當然考察臺馬文學關係不一定要從這四個面向出發，或僅限於這四個面向。但本文要指出的是，這四個現象或面向構成的臺馬文學關係或《蕉風》與臺馬文學關係，背後的脈絡是一個亞洲南方國際之間的「亞

September 22, 2021 收到稿件 / May 31, 2022 接受刊登

《中山人文學報》no.53 (July 2022): 1-17

§ 張錦忠，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博士，現為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Email: tktung@faculty.nsysu.edu.tw

際華語圈」(Sinophone sphere)的概念。在這個華語圈內，文本的流通與接受、作家的移動、文化資本的強弱等都影響了各個文學系統或複系統之間的關係發生與互動。而不同文學場域之間的轉運流動，其實有賴於「文學漫延」(literary diffusion)實力的高低。

壹、冷戰與美援文化

描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馬華文學場域通常涉及幾個關鍵詞：冷戰、美援、左翼、現實派、現代派。把一個「文學場域」放在「冷戰」的脈絡來看，其實是一種「文學地緣政治」(literary geopolitics)的概念。^[1]而冷戰本身就總已涉及地緣政治了。談冷戰，總會提到東西陣營、北大西洋公約機構、華沙公約機構、第三世界、亞非拉國家、不結盟國家等名詞，其中多半關涉地輿空間。「冷戰」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非軍事行動（或有限規模軍事行動）圍堵以蘇聯為首的歐亞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擴張，以免骨牌效應發生，非共國家被「赤化」（共產化、史達林主義化），因此，圍堵(containment)、推回(rollback)為冷戰的重要戰略。圍堵、推回佈局當然是軍事、政治行動，但如果「人心思變」，軍事、政治行動也無法挽狂瀾於既倒，而「人心思變」多半受到經濟與思想因素影響，因此，在冷戰戰略裏頭，文化資本的生產、流通、供需之重要性，並不下於戰爭物資或武器。換句話說，冷戰揭幕，一場「心靈爭奪戰」早已開打，此所以美援文化、綠背文化在戰後的華語圈開始漫延擴散(diffuse)，展開跟左翼文化的話語權鬥爭，以完成意識形態圍堵的戰略佈局。在這個舊帝國的黃昏，美蘇新帝國在歐陸的暮色裏崛起，柏林圍牆分割了兩個對峙的世界；在遠東，相同模式的地緣政治也宰制了幾乎半個世紀之久。文學成為形塑這樣的意識型態的載體，文學產品也再現了地緣政治下的生命經驗。一方面，不同文學場域之間的關係，反映了冷戰地緣空間的政治關係。另一方面，文學表現模式、品味的展現、文學思潮與作品的引進，皆旨在佔據文學場域的空間及位置。因此，不管是（社會）現實主義或現代主義，都可說是在文化地緣政治的框架下的輸入與轉譯。

職是，一九五〇年代臺灣、香港、新加坡與馬來亞的華文文學生產與流通，可以說，無論是左翼或非左翼文學，都是冷戰時代或冷戰脈絡下的

產物。說左翼文學在戰後的馬華文學場域中佔有一席之地並不為過。一九四七年的「馬華文藝獨特性」座談會，以及隔年展開的「僑民文學論戰」主要就是圍繞著文藝現實性的議題討論。左翼文學的政治、階級、情感訴求十分明顯，打著「現實主義」的大纛，成為那些年的馬華文學當道主流。易言之，在馬華文學場域，「左翼」與「現實派」（現實主義）頗有重疊之處。提倡現實主義的作家如方修，提到影響的來源，舉的例子也是高爾基（Maxim Gorky）的《母親》（*The Mother*）、法捷耶夫（Alexander A. Fadeyev）的《毀滅》（*Razgrom*）、綏拉菲摩微支（Aleksandr S. Serafimovich）的《鐵流》（*Zheleznyi Potok*）這些社會現實主義文學的典律。《毀滅》的中譯者即有「中國的高爾基」之稱的魯迅。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的《蕉風半月刊》提倡純馬來亞化的文藝路線，呼應三十年代南來作家的「在地化」呼籲，同時回應當時的獨立建國氛圍。《蕉風》創刊的時機，正值反殖民主義、爭取獨立自主的年代，地下鬥爭近十年的馬來亞共產黨人也與自治政府展開談判。在亞洲，萬隆會議剛剛召開，韓戰停火不過兩年，奠邊府戰役剛剛結束沒多久，烽火硝煙記憶猶新，中蘇交惡，而歐洲則有華沙公約簽署，以及次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因此，《蕉風》創刊初期提倡的「純馬來亞化」呼應的也是一個非共的民族國家的臨來。那當然是冷戰框架下的建國藍圖。「馬來亞化」勢必正視「此時此地」的現實環境。這可以在創刊後的《蕉風半月刊》內容看出端倪。換句話說，落實「馬來亞化」，勢必要提倡寫實主義（因為那就是「此時此地」的表述形式），勢必要面對一個馬來世界的現實，因此透過馬來民間故事、馬來亞風土人情的介紹，馬來班頓譯介，去了解「努山塔拉」（Nusantara）這個馬來世界，是很踏實的做法。

到了《蕉風》第七十八期，提出新詩再革命、個體主義、人本主義，已是一九五九年的事了，離刊物創辦、提倡純馬來亞化的一九五五年，已有四年之久了。白垚本人也示範了「純馬來亞化」的書寫：麻河、八達嶺（八打靈再也）……地方感性早已如拉浪草般蔓延滋生。但是第七十八期也是現代主義在馬華文學冒現的平台。這裏現代主義的提出，即是前衛的詩的理念的鼓吹，也為個體主義張目。故我視之為馬華文學的「第一波現代主義」。

正是現代主義、現代詩的提倡，讓《蕉風》得以與香港、臺灣的現代主義介面搭上線，我們也得以在「華文現代主義／華語語系現代主義」(Sinophone Modernism)的框架下檢視其間的「文學關係」。不過，我無意在這裏同時處理「臺港馬文學關係」或「港馬文學關係」(我過去曾描述過「在中國周邊的現代主義傳播路徑」，即已涉及港臺馬)，而僅僅聚焦於「臺馬文學關係」，亦即兌現本文預期的工作——以發表於《蕉風》的臺灣作家作品為例，描繪這些「流動性臺灣文學文本」於臺灣境外的華語語系場域「在場」，並「參與」了一九六〇年代華文現代主義文學運動，^[2] 詮釋它們在馬華文學複系統的位置與功能。

如何描述這樣的「臺馬文學關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不乏視一九七〇年代以前馬華文學場域的「非左翼」文學生產為「民國文學」的論調，尤其是一九五五年創刊的《蕉風半月刊》上的作家作品，例如馬來西亞學者莊華興便撰有〈戰後馬華（民國）文學遺址再勘察〉等論文討論這個議題。「民國文學」一詞用在獨立後的馬來亞／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彙編，固然是個不無時差之嫌的指稱，不見可能多於洞見，但也引發我們重新思考臺馬文學關係，特別是冷戰時期以降兩地的文學交流。^[3] 這樣的思維有助於我們「回到民國文學」去思考一九六〇年代的「華文現代主義」與「臺馬文學關係」。

這篇論文認為臺馬文學關係是冷戰時期以來亞洲國際之間的「華語圈」裏頭文學流動、漫延現象的反應與反映，我們不妨以流動的文化資本視之。這個華語圈的文化資本跨境流動軸線——臺灣—香港—南洋（尤其星馬），恰恰是冷戰時期一個圍堵北方共產主義浪潮向南擴散的三角區塊，以南海為中心，足以自成一「共同體」或「環境世界」(Umwelt)。當北方的意識形態以社會現實文學文本為載具，星馬的左翼作家奉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星華文藝協會的「馬華文藝獨特性」座談會所主張的文藝思想為圭臬，在南洋擴散漫延，「非左翼」的一方勢必要爭取這個三角區塊內的讀者群眾，或提供他們另一種選擇及可能，以遏制社會現實主義的教條思想。這樣的另類話語包括英美文學，特別是其中的「反共文學」，以及歐美因受到二戰干預而斷裂的現代主義。

以當時馬來亞與新加坡華文文學場域的文化資本或文學彙編而言，其

實有所不足。因此，《蕉風》的出現，可以說填補了這樣的不足，而一九六〇年代的編者（特別是黃崖）可以說掌握了足夠的文化資本與文庫彙編（例如臺灣作家的稿源），才能實踐刊物的文藝主張與文學理念，推動華文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發揮影響力，將《蕉風》打造成後來論者如林春美說的「非左翼的馬華文學」的大本營，並以吉隆坡為中心，發展跨國文學關係。

「跨國文學關係」為跨國文學生產、翻譯、流通、漫延、擴散、讀者接受、作家交流等現象的反映。其中臺灣文學作品在《蕉風》的刊載即涉及上述現象，或可從上述面向檢視。近年論及黃崖者多謂他擔任《蕉風》主編時刊載最多臺灣文學作品。因此，探討《蕉風》與臺馬文學關係，不妨檢視這時期《蕉風》刊載臺灣作家作品的情形。簡而言之，我們所說的《蕉風》與「臺馬文學關係」，首先當然是從《蕉風》所刊臺灣作品或關於臺灣或臺灣文學的作品的情形來檢視。但問題是事隔多年，五、六〇年代的「友聯人」兼《蕉風》編輯者多已作古，我們無從得知早期《蕉風》編者的執編始終時間，只能爬梳史料，整理出一份相對可靠的不同時期的《蕉風》編者名單。但是馬華文學史料相當匱乏，原始材料的保存與取得也都是問題；網路流通固然便捷，看似有助於文獻的取得，但往往以訛傳訛，使用者多未覆核，就採用為論述的佐證，結果可想而知。早期《蕉風》編者的相關資料就是很好的例子。

《蕉風》在友聯旗下共出版了四百八十八期，從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算起，到一九九九年二月，超過四十四年，除了歷經多位主編、執編、編輯委員、不同開本之外，也經過半月刊、月刊、雙月刊的不同時期。我們以上述哪一項為「斷代」依據，恐怕都可以呈現不同的詮釋。《蕉風》在創刊時是半月刊，到了三年後，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七十三期，宣布改為月刊，並增加篇幅。編者在第七十二期給的說法是：

文藝是沒有迫切時間性的，一份文藝刊物也不似新聞性報刊，要緊緊地掌握著時間。因此，本刊為了提高馬華文藝的水準，加強本刊的內容，決定自下期起改為月刊。（〈本刊啟事〉4）

因此，我們不妨稱第七十三期以前的《蕉風》的第一個時期為「半月刊時期」。「半月刊時期」編者開宗明義以「純馬來亞化」為編輯方針。誠如編委申青

在《蕉風》創刊三週年所說的：「希望能把華文文藝馬來亞化，使馬華文藝能在馬來亞的原野上生根茁長」（〈稿約〉17）。因此，徵稿啟事也清楚指出「凡以馬來亞為背景的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皆所歡迎」。這則徵稿啟事應該不是「排外條款」，否則就表示五〇年代的臺灣作家不太可能投稿《蕉風》，除非是遊記之類的文章。

貳、臺灣作家在《蕉風》

「半月刊時期」的《蕉風》發表的第一篇臺灣作家或具臺灣關係的作者的文章，考證起來可能有點困難。困難原因主要是作家發表多用筆名，一人數個筆名者不少（創刊時期主編方天自己就有好幾個筆名），同時也無法排除港臺南洋作家筆名相同的情形。例如，《蕉風》第四十七期有個「何方」。民國一臺灣作家何方原名趙泉，安徽人，一九四九年渡臺。早年寫詩，著有詩集《秋的獨白》、《南沙之歌》、《七根辮子的姑娘》，後來以編劇、導演聞名。「何方」在《蕉風》刊出的詩有〈除下你的黑眼鏡〉（第47期）與〈夜吟〉（第59期）。一九五九年後，影劇系畢業的何方回到本行。但是到了一九六三年，《蕉風》的第一波現代主義運動餘波盪漾，編者撥版位讓讀者、作者討論現代文學利弊時，「何方」亦有來稿〈打開門戶〉擁護現代文學。這時臺灣現代詩人何方早已投入影劇圈，何以還會跨海對《蕉風》的編輯路線表達意見，啓人疑竇。^[4]

《蕉風》第五十一期(Dec. 1957)刊登了謝冰瑩的小說〈文竹〉。在確認「何方」身份之前，我們只能暫以謝冰瑩為第一個在《蕉風》的「半月刊時期」發表作品的臺灣作家，或者說謝冰瑩是《蕉風》「半月刊時期」發表作品最多的臺灣作家，應該比較客觀。謝冰瑩(1906-2000)是一九四八年秋天來臺的民國作家，五〇年代曾赴馬來亞三年。一九五七年她在太平華聯中學教書，《蕉風》在第四十五期〈文訊〉提到她八月訪太平。第五十一期即刊出〈文竹〉。第六十六期(July 1958)、第六十九期(Sept. 1958)都有謝冰瑩的散文與小說刊出，分別是〈母親的生日〉與〈伙伙李林〉。第五十六期(Feb. 1958)還刊出煥樂的〈謝冰瑩與我〉。編者在第六十九期提到那年八月謝冰瑩訪星時編輯部曾向她邀稿，將來文章結集出版，列入蕉風出版社的「蕉風文藝叢書」。這顯然沒有成真，一九六一年謝冰瑩出版了《馬來亞遊

記》(上)，出版者是臺北的海潮音月刊社。謝冰瑩在馬期間繼續給《蕉風》供稿，到了一九六〇年三月《蕉風》第八十九期隨刊附送的中篇小說就是謝冰瑩的《愛與恨》。她到一九六七年都還有作品在《蕉風》發表。謝冰瑩訪馬時早已是民國知名作家，而且是中國文藝協會理事，旅馬期間交了不少文友，日後他們的回憶總會提到她。^[5]

繼謝冰瑩之後，在「半月刊時期」的《蕉風》發表作品的臺灣作家是李靖寰，編者特別說明作者目前居住於臺灣。第五十二期刊了他的散文〈寂寞芳心〉、第五十三期刊登他的小說〈續絃〉。第五十五期則是小品〈談愛情〉，看來是個全面的作者。^[6] 這時期《蕉風》的臺灣作家或有臺灣關係的稿件，還來自當時在中興大學任教的程兆熊以及在南洋大學任教的潘重規。程兆熊發表了〈籬籬神話〉(第 53、54 期)與〈石氏女神話〉(第 60、61 期)。潘重規則在第七十、七十一期發表了〈胡適《紅樓夢》考證質疑〉。此外，《蕉風》第五十八期發表了滄海客的〈讀「雞尾酒會」後〉，評吳魯芹的散文集《雞尾酒會及其他》，雖然作者讀的是香港友聯版吳著，另外第七十期合金的〈談詩創作〉也引述了楊喚的詩。滄海客與合金顯然熟悉臺灣文壇。

值得一提的是，彰顯「半月刊時期」《蕉風》臺馬關係或具臺灣色彩的不只是文學作者，還有美術家。早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出刊的第三十七期，封面就是何恭上的木刻《邊疆舞》。那一年登上《蕉風》封面的除了何恭上作品之外，還有何政廣、陳其茂的木刻。一九五八年則有何恭上的剪紙與何政廣的木刻。《蕉風》當年封面多用木刻，主要是便於做電版套色印刷，也可能是因為木刻題材多呈現民間生活與地方色彩。不過，值得指出的是，臺灣木刻家刀下呈現的畫面，其實不見得反映熱帶風情（從何恭上的作品看來，他似乎當時到訪過南洋），而是臺灣景物。當年《蕉風》鼓吹「純馬來亞化」，編者也主張封面畫在地化，採用得較多的還是鍾泗濱、劉抗等表現馬來風土人物、南洋色彩強烈的作品。

《蕉風》創刊的年代，恰恰是星馬華人如火如荼興學辦南洋大學的年代。那固然是最後一批民國離散文人南來的年代，卻也開啟了民國學人南來的時代，馬來亞大學、南洋大學都不乏離散港臺的民國學人應聘前往教學的案例。潘重規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但也有助於我們在談「臺馬文學關

係」時在分類上更為精確。從「半月刊時期」的《蕉風》開始，《蕉風》所刊臺灣作品或關於臺灣或臺灣文學的作品至少已經可以這樣分類：

- (一) 臺灣作家自行投稿
- (二) 臺灣作家旅居星馬期間投稿
- (三) 臺灣學者旅居星馬期間投稿
- (四) 臺灣作家訪馬後投稿
- (五) 《蕉風》編者邀稿
- (六) 《蕉風》編輯轉載
- (七) 臺灣作家透過文友投稿
- (八) 星馬作者論述臺灣文學稿件

這個分類模式一直到友聯時期的《蕉風》(第 488 期)停刊都適用。

參、黃崖主編《蕉風》時期的臺灣現代文學

《蕉風》從「半月刊時期」進入「月刊」時期，在時間上，過了一年，就進入一九六〇年代，也就是從黃思騁到黃崖擔任主編時期。《蕉風》在一九六九年改革，一個以陳瑞獻為中心的現代主義運動從新加坡跨過新柔長堤，在七〇年代初的《蕉風》擴散，漫延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形成馬華文學第二波現代主義運動風潮。但第一波在六〇年代初展開，正是黃崖擔任主編時期，而他的現代主義文學論述，多來自臺灣，又經常刊登臺灣作家稿件。故論者多指出黃崖擔任主編時期，刊載臺灣作家稿件特別多，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既然以「黃崖主編《蕉風》時期」來「斷代」，黃崖何時接編、編至何時，應該有所說明。如前所述，斷定《蕉風》編者任期其實是《蕉風》研究者的困境。由於《蕉風》早期編者多未署名，要明確斷定誰編到何時十分困難，也無法完全以編者離開友聯機構或刊物為判準。這裏姑且依據林春美的考證，把「黃崖主編《蕉風》時期」定位於一九六一年五月(第 103 期)至一九六九年七月(第 201 期)(林春美 136)。^[7]

如前所述，論者多說黃崖擔任《蕉風》主編時期《蕉風》刊載臺灣作家稿件特多，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因為有臺灣作家在那十年間的《蕉風》的發表數據可以統計，然後跟「半月刊時期」或七〇年代以後的《蕉風》

比較，就看得出來。就這一點而言，論者的觀察是對的。但是我們應該要問的是：這些「臺灣文學在《蕉風》」的功能是甚麼，發揮了甚麼作用？或者產生了甚麼回應或影響？這是文學系統關係與接受美學的問題。

黃崖時期的《蕉風》刊登了痙弦、羅門、覃子豪、周夢蝶、蔡文甫、余光中、葉珊、王敬羲、葉維廉、白先勇、蔣勳、季薇等人的稿，幾乎所有當時的知名臺灣詩人作家都在那裏發表，而且頗多不止一篇。^[8] 這些臺灣作家是重量級的現代作者，各領華文文學風騷數十年，可謂一時之選；他們的作品出現在《蕉風》，充實了刊物的內容，提供讀者閱讀域外文學的窗口，同時也提供在地作者觀摩另一個華文文學場域的文學表現，讓《蕉風》成為六〇年代的東南亞華文文學中心。不過更重要的是，臺灣作家在《蕉風》出現，除了是東南亞華語圈或南方華文文學的跨國流動之外，也是編者以臺灣現代文學文本支援馬華現代文學文庫彙編的編輯策略，有助於華文現代主義文學在新加坡與馬華文學系統中冒現。換句話說，馬華在地青年作者，固然在《蕉風》以及黃崖的推動之下，產生了現代風格與技巧的作品，但質量未必足夠支撐一個現代主義運動的規模與運作，因此有必要借重外援，來充實馬華現代文學文庫彙編。

臺灣作家在《蕉風》密集出現，是一種跨國流動現象，這種流動可視為「文學擴散」的運轉流動。這是我若干年前已提到的文學系統流動理論。^[9] 怎樣的文學系統會向另一個文學系統漫延擴散？基本上，小場域的文學系統較弱，資源與市場機制都有所侷限，因此屬於漫延力低(*lesser diffusion*)的文學系統；大場域的文學系統較強，於是小場域裏的書寫者會趨向往大場域漫延流動。例如，在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的臺灣文學，文學獎令人矚目、出版蓬勃、市場熱絡，而馬華作者一旦在臺灣獲得文學獎，有如魚躍龍門，一舉成名。因此，說七〇、八〇年代的臺灣文學，相對於馬華文學場域，屬於漫延力高的文學場域，大概沒有人反對。換句話說，馬華寫作者有人會選擇「外流」留臺、參加臺灣文學獎，在臺灣出版，毋寧是很自然的事。這也可以解釋七〇年代初星座詩社諸人涉及的那場文學認同與文化回歸論爭，固然是替自己的「外流」辯護，但從漫延的角度來看，其實也是常態，他們只是從一個漫延力低的文學場域流向一個漫延力高的文學場域而已。^[10]

相對於七〇、八〇年代的臺灣文學場域，五〇、六〇年代的臺灣文學場域漫延力較低。五〇、六〇年代的臺灣文學的主流是反共文學、現代詩、現代（主義）文學、翻譯文學、通俗文學。在新類媒體還沒有興起的年代，在冷戰的年代，文學與美術是藝文界表現與抒發情動力的管道，或苦悶的象徵的載體。這些文學能量在臺灣文學場域需要有足夠的空間釋放，文學「界」才能展現生產與發表平衡的狀態。但在彼時的冷戰或白色恐怖氛圍，五〇、六〇年代的臺灣文學場域可以說是一個供需失衡的場域，主流意識形態與通俗市場佔居太多空間。五〇年代末的《蕉風》「文訊」欄提供了相當有意思的外部觀察，可以作為瞭解那個年代臺灣、香港、中國文壇的「週邊文本」(paratext)。例如，《蕉風》第四十二期(July 1957)「文訊」欄提到臺灣文藝不景氣，發表空間萎縮，連《文壇》雜誌也停刊（後來才復刊），許多作家向海外發展。第六十七期提到因文藝書刊滯銷，出版社多不用新稿，而重印舊刊或翻印舊譯等。

這個「外部觀察」或許可以解釋為甚麼五〇、六〇年代的臺灣作家願意投稿海外（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例如香港的《中國學生周報》，以及黃崖時期的《蕉風》。臺灣作家需要發表園地，黃崖及他所推動的現代文學話語需要現代文學文本，使得臺灣作家南向，往南洋文學場域漫延，提供馬華文學場域的《蕉風》足夠的文本持續運作，除了「純馬來亞化」之外，也朝「純文學」、「現代文學」的方向前進。而且，如果黃崖確定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第 103 期）接手《蕉風》編務的話，他可能只是擴大《蕉風》原有的政策了吧，因為臺灣文本作為馬華文學場域的文學符號的文學關係的意義早在《蕉風》第八十期(June 1959)附送新詩小冊《美的 V 形》與第八十三期(Sept. 1959)附送新詩小冊《郊遊》所收詩作就已獲得彰顯。這兩本附冊是馬華現代詩最早的詩選，刊行後現代詩乃有足夠的典律與彙編建構它在馬華文學系統的位置，而這兩冊詩選集，收入的卻多半是臺灣現代詩人的作品，包括羅門、龔虹、余光中、葉珊、周夢蝶、王憲陽、上官予、阮囊等人的創作，以及覃子豪的譯詩，有了這兩本詩選，加上同時期（一九五九年那關鍵的一年）白垚在《蕉風》發動的一系列現代詩論述／論戰，馬華現代詩的「蕉風派」乃得以成形，是為第一波現代主義的前哨先鋒。誠如鄧觀傑在他的碩士論文《華文現代主義的旅行與變貌：以

上海、香港、南洋為路徑(1930-1970)》(國立政治大學, 2021)論及黃崖時所指出,黃崖大量刊載上述重要域外作品,「極大程度地形塑了星馬文藝青年的文學品味」(鄧觀傑 159)。

因此,我們不妨說《蕉風》在黃崖主編時期,延續刊物的人本主義與自由主義理念,加上黃崖以他的才能與人脈,充分利用友聯的美援資本優勢,掌握了東南亞華語圈的流動文化資本,強化了馬華文學現代主義文庫彙編,完成了階段性任務,到了六〇年代中葉以後,第二波現代主義風潮捲起時,《蕉風》才得以「無縫接軌」地開展新的一波現代文學運動。

肆、七〇年代以後《蕉風》裏的在臺馬華與臺灣作家

如前所述,一九六九年底、七〇年代初,發軔於新加坡《南洋商報·文藝》與五月出版社的現代主義運動,因陳瑞獻加入《蕉風》編輯陣容(那幾年的其他編委主要是白垚、李蒼、周喚、姚拓)而展開了星馬華文文學的第二波現代主義風潮。自二〇二期開始再度向現代主義傾斜的《蕉風》強調的是在地的現代主義,因此一反黃崖主編時期密集刊登港臺作家稿件的編輯方針,所刊創作與翻譯大都出自星馬作者譯者手筆。這時期有幾個現象值得討論。首先是「在臺馬華文學」的現象。冷戰政治與文化及教育美援的其中一個項目是僑生教育政策,因此自一九五〇年代僑教實施以來,臺灣也成為馬華留臺寫作者展示文采的場域。早年的縱橫詩社、臺大海洋詩社都不乏馬華僑生成員。但較大規模的則是六〇年代的星座詩社與七〇年代的神州詩社。

「在臺馬華文學」有濃厚的中華民國僑教政策脈絡,是星馬婆「僑生」留學臺灣,在臺灣參與文學生產的現象。換句話說,「在臺馬華文學」首先是「留學生文學」。從「留臺」到在臺灣居留,顯然是時間的產物。星座詩社成員在六〇年代來臺留學前,不少人已具馬華寫作者的身份,來臺後也常寄作品回去《蕉風》發表。神州詩社成員原屬馬來西亞美羅的天狼星詩社,溫瑞安來臺前甚至已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將軍令》,其他社員(如方娥真、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多在《蕉風》與《學生周報》文藝版發表作品,來臺後作品也常在《蕉風》出現。《蕉風》在七〇年代組「留學生作品」專輯,作者群也以留臺生為主。幾個詩社成員之外的其他來臺的「個

體戶」，從張寒、李永平、李有成、余崇生、賴敬文、顏宏高、丘瑞懋、商晚筠、賴瑞和、張貴興、胡寶珠到八〇年代後的陳強華、王祖安、黃錦樹等，留臺後在不同時期也都從臺灣寄稿件給《蕉風》，我自己也是如此。因此談這時期的《蕉風》與臺馬文學關係，勢必無法忽略這批「在臺馬華文學」或「離散雙鄉」的馬華作者。這群留臺作者中，有人在當年的兩大報文學獎時代參加徵文比賽獲獎，《蕉風》或發佈獲獎訊息，或轉載得獎作品，將臺灣文壇盛事與馬華同鄉獲獎喜訊納入讀者視野。

其次就是臺灣在七〇年代以後，一方面因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位而衍生存亡危機，另一方面連帶也產生文化、身份的反思。鄉土文學運動的冒現，也是源自這樣的自省、直面生存空間的現實臨迫感。這時期除了官方活動之外，臺灣作家文人出國者，除了歐美，處於「亞際華語圈」的東南亞也在訪問之列。後來亞洲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亞際交流日益頻繁，不少臺灣作家或出國參訪，或應邀擔任文學獎評審，展現了臺灣文學的漫延力。這樣的交流活動，也反映在《蕉風》。臺灣作家訪馬時，有的接受刊物訪問，有的返臺後，寄稿給《蕉風》發表，這些例子甚多，包括余光中、柏楊、陳映真、羅青、楊平、林煥彰、李昂、張系國等。

馬華文學的戰後以來，社會現實主義蔚為主流，後來現代主義浪潮崛起，形成兩個對壘的陣營，當然是冷戰的產物。擁護現代主義者強調文學自主、創作自由，社會現實主義主張文學層屬社會、政治；那其實是文學政治與意識形態之爭，或文學的社會向度問題，與書寫者在自身的「環境世界」創作、自我表述或隱蔽、文字與再現、文學與真實、生命經驗等文學創作問題無直接關係，更非關文學對外在環境地輿空間的模擬或照映。馬來西亞社會發展，從農業朝向工業邁進的步調不算快，許多馬華作家筆下的地景或空間樣貌亦多為鄉村景物，現實感強，地方色彩濃。因此，儘管臺馬兩地風土民情有異，臺灣鄉土文學與馬華文學在題材上的出入並不算大。在臺馬華作者，如商晚筠，留臺後從個人抒情散文轉向小說書寫，取材記憶中的家鄉週遭人物與事件，顯然是受到臺灣鄉土文學運動的啟發。《蕉風》當時即刊載了商晚筠的〈癡女阿蓮〉系列小說。商晚筠畢業後返馬，一九七八年也在《蕉風》發表她的中篇小說〈夏麗赫〉（第305期）。

結 論

從《蕉風》看臺馬文學關係，自文化美援時代與半月刊時期以來，可以有更多面向的解釋，也涉及各時期《蕉風》編者的理念與視野。本文從亞際華語圈文學流動現象出發，勾勒冷戰框架，以臺灣作家在《蕉風》為例，指出文學系統之間自有相互漫延的趨勢與能量，而臺灣文學向更南方的華語語系場域漫延之後，成為《蕉風》當時編者（特別是黃崖）建構現代文學典律的助力，豐富了《蕉風》的內容與馬華現代主義文學的文庫，對引發第一波馬華現代主義浪潮有推波助瀾之功，同時彰顯了《蕉風》在六〇年代打造一個東南亞華文文學中心的宏觀視野。

◎本文初稿宣讀於二〇二一年臺灣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洋流與伏潮：共享互惠流動的臺灣／東南亞」(2021 Annual Conferenc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aiwan—Under/Currents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Sharing Flows and Reciprocity)，3 Sept. 2021，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線上會議。感謝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王梅香教授籌組團隊並邀請與會，以及同組成員的講評討論，也感謝本刊三位論文外審同行對本文提供修訂建議，令我受益良多。

註 釋

1. 法國社會學家波迪宥(Pierre Bourdieu)的「文學場域」理論，中文文學界引用最全面者，當屬張誦聖，其《文學場域的變遷》(2001)等著作俱為文學場域的理論與實踐的演示，可參閱。波迪宥的文學場域相關論述，可見《文化生產的場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Randal Johnson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與《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後者有石武耕、李沅洳與陳羚芝合譯的中譯本(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16)。讀者可自行參閱；本文就不覆述已廣為學界所知或落實的波記場域理論了。
2. 這裏的 Sinophone 固然來自「華語語系」，不過本文中的 Sinophone 不盡然是晚近諸家「華語語系」論述(Sinophone Studies)的概念，故有時用「華文」，有時用「華語語系」。用「華語語系」時指的是作為「語系文學」的華文文學。無論如何，在中文的語境，「華文文學」應該也足以勝任

- 「華語文學系統」的指涉。
3. 相關討論可參閱拙文〈遺址與慢船：民國的幾道陰影與馬華文學〉，《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no.9 (2021):16-21。莊華興的〈戰後馬華（民國）文學遺址再勘察〉刊於《臺灣東南亞學刊》11.1 (Apr. 2016): 7-30。
 4. 何方資料見「何方」，臺灣作家作品目錄資料庫，《臺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臺》，國立臺灣文學館(db.nmtl.gov.tw/site4/s6/writerinfo?id=367)。當然可以將何方這兩首詩跟三本詩集裏頭所收詩作比對，不過手邊無何方詩集，無法查證。郭馨蔚的碩士論文《臺灣、馬華現代主義思潮的交流：以〈蕉風〉為研究對象(1955-1977)》附錄了一個相當詳盡的「臺灣作家在《蕉風》發表作品（創作、譯作）及專輯列表（1-350期）」，頗有參考價值，不過錯訛之處也在所難免，須進一步查證。詳郭馨蔚(2016)。
 5. 李靖寰何以會投稿《蕉風》，無從查證。一九八〇年代初的《自由談》雜誌曾刊出李靖寰的隨筆兩篇：〈尋根究底澎湖行〉(32.9[1981.9])與〈憶北國之冬〉(33.1[1982])。應該是同一人。
 6. 李靖寰何以會投稿《蕉風》，無從查證。一九八〇年代初的《自由談》雜誌刊出李靖寰的隨筆兩篇：〈尋根究底澎湖行〉(32.9[1981.9])〈憶北國之冬〉(33.1[1982])。應該是同一人。
 7. 黃崖何時接編《蕉風》，應該跟黃思騁編到何時不編一塊考證。黃思騁南來，是在一九五九年底或一九六〇年初，應吉隆坡中文《虎報》之聘，《虎報》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停刊，他應該是隔年到麻坡中化中學教書，一九六三年返港。郭馨蔚的碩士論文《臺灣、馬華現代主義思潮的交流：以〈蕉風〉為研究對象(1955-1977)》附錄了「《蕉風》歷代編輯列表」，參考了李錦宗編的〈蕉風歷任編輯〉與南方學院蕉風網頁所列編輯名單，但這份資料仍然存有許多疑點。
 8. 王敬義、葉維廉固然來自香港，但活躍於臺北文壇，視之為那段期間的「臺灣作家」也未嘗不可。他們的作品在《蕉風》出現時也是在他們赴美深造之前，如係赴美之後則可能是轉載之作。
 9. 近年來也有外國學者重探文學漫延理論，參閱，例如 Agamirza E. Bashirov & Gunesh Bashirova, "Dynamics of Literary Texts and Diffusion." *Onlin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Technologies*, 1.3 (July 2011), DOI:10.29333/ojcm/2339。
 10. 一九七二年，林綠、賴瑞和等人在《中國時報》的「海外專欄」討論旅臺馬華作者的文化回歸與自我放逐。隔年馬華作者葉嘯等人也在《蕉風》延續相關論爭。部分文字見《中國時報》(編)《風雨故人》(臺北：晨鐘出版社，1972)。

徵引文獻

- 〈本刊啟事〉(1958)。《蕉風半月刊》no.72(Oct.): 4。
- 鄧觀傑(2022)〈大眾化、反共、馬來亞化：黃崖與六〇年代《蕉風》現代主義〉。
張錦忠、黃錦樹、李樹枝(編)：《冷戰、本土化與現代性：《蕉風》研究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離散／現代性研究室)，155-183。
- 〈稿約〉(1958)。《蕉風月刊》no.73(Nov.): 17。
- 郭馨蔚(2016)〈臺灣、馬華現代主義思潮的交流：以《蕉風》為研究對象(1955-1977)〉。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臺南。
- 林春美(2021)《〈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臺北：時報文化)。
- 申青(1958)〈展望馬華文藝的遠景：為《蕉風》三週年而作〉。《蕉風半月刊》no.72(Oct.): 4。
- 謝冰瑩(1957)〈文竹〉。《蕉風半月刊》no.51(Dec.): 6-9。

WORKS CITED

- “Benkan qishi” [From the Editor] (1958) *Chao Foon* no.72(Oct.): 4.
- Teng Kuan Kiat (2022) “Dazhonghua, fangong, Malaiyahua: Huang Ya yu liuling niandai *Jiao Feng* xiandai zhuyi” [Popularization, Anti-Communism, Malayanization: Huang Ya and the Modernity of *Chao Foon* in the 60’s]. TEE Kim Tong, Ng Kim Chew, Lee Soo Chee (eds.): *Lengzhan, bentuhua yu xiandaixing: Jiao Feng yanjiu lunwenji* [Cold War, Localization and Modernity: Essays on *Chao Foon Literary Magazine*] (Kaohsiung: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 Diaspora/Modernity Research Unit, National Sun Yet-sen University). 155-183.
- “Gaoyue” [Call for Papers] (1958) *Chao Foon Monthly* no.73(Nov.): 17.
- Kuo Hsin Wie (2016) “Taiwan, Mahua xiandai zhuyi sichao de jiaoliu: Yi *Jiao Feng* wei yanjiu duixiang” [Modernist Currents in Taiwan and Malaysian Literary Field: The Case of *Chao Foon* (1955-1977)], Master thesi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 Lim Choon Bee (2021) *Jiao Feng yu feizuo yu de Mahua wenxue* [Chao Foon and the Non-leftist Mahua Literature]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 Shen Qing (1958) “Zhanwang Mahua wenyi de yuanjing: Wei *Jiao Feng* sanzhounian erzuo”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of Mahua Literature: Writing for the Third Anniversary of *Chao Foon*]. *Chao Foon* no.72(Oct.): 4.
- Xie Bingying (1957) “Wen Zhu”. *Chao Foon* no.51(Dec.): 6-9.

摘要

近年不乏視一九七〇年代以前馬華文學場域的「非左翼」文學生產為「民國文學」的論調，尤其是一九五五年創刊的《蕉風半月刊》上的作家作品，例如馬來西亞學者莊華興便撰有〈戰後馬華（民國）文學遺址再勘察〉等論文討論這個議題。「民國文學」一詞用在獨立後的馬來亞／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彙編，固然是個不無時差之嫌的指稱，不見多於洞見，但也引發我們重新思考臺馬文學關係，特別是冷戰時期以降兩地的文學交流。本文將檢視發表於《蕉風》的臺灣作家作品，描繪這些於臺灣境外的華語語系場域「在場」並「參與」了一九六〇年代華文現代主義文學運動(Sinophone Modernism)的「流動性臺灣文學文本」，詮釋它們在馬華文學系統的位置與功能。本論文認為臺馬文學關係是冷戰時期以來亞洲國際之間的「華語圈」(Sinophone sphere)裏頭文學流動、漫延(diffuse)現象的反應與反映，我們不妨以流動的文化資本視之。因此，《蕉風》一九六〇年代的編者（特別是黃崖）可以說掌握了足夠的文化資本，才能配合刊物的文藝主張與文學理念，推動華文現代主義文學思潮。

關鍵詞：《蕉風》、臺馬文學關係、華語圈、文學流動、黃崖

Literary Diffusion in Inter-Asian Sinophone Sphere Charting *Chao Foon* and Taiwan-Malaysian Literary Relations

TEE Kim To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have attempted to view Sinophone "non-left writings" produced in the Malaysian literary field before the 1970s as "Republican literature" [*Minguo wenxue*], a term related to the pre-1949 Republican period of Nationalist China. Specifically, the term refers to the works published in *Chao Foon*, a literary magazine founded in 1955 in Singapore, before and around the 1970s. However, since Malaya gained her independence from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1957, and local residents, qualified immigrants included, were granted Malayan citizenship, the term "Republican literature" becomes an obvious misnomer. Despite its inaccurate designation, such a label helps motivate the exploration of literar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nophone systems of Malaysian and Taiwanese Literature. Examining the works by Taiwanese writers published in *Chao Fo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presence of these texts in the magazine reinforces the local Modernist literary repertoire.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texts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participation and diffusion of Taiwanese writers in the Modernist move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inophone sphere especially in the 1960s, within the Cold War framework. Moreover, with this cultural capital from Taiwan at hand, Huang Ya, the editor of *Chao Foon* from 1961-1969, together with Bai Yao the poet-editor, were able to launch the first wave of Modernist movement in the history of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KEYWORDS: *Chao Foon*, Taiwan-Malaysian Literary Relation, Sinophone sphere, literary diffusion, Huang Ya